越嚼越有味的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

陈学慧

中国经济新常态，已成为国际经济界人士的“炙热”话题。

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的一句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参加了很多年，每次都感到非常激动”，是开场白，也是大实话。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年年带来有深度的研究。在2013年的发展论坛年会上，《经济日报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。当时，这位经济学家清晰地表述，“中国经济正进入历史性转折期。我相信中国经济增速仍可维持在7%左右的水平。需要强调一点，继续维持7%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第一位的，首要的是要看质量。”他今年初发表的《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》，再次引发关注和争论。在本次论坛上，他做了长达20多分钟的演讲，“如果中国能够做好的话，我觉得是能够保持7%这样一个新常态增长率的。”斯蒂格利茨的观点鲜明而不动摇。

老朋友还真不少。史蒂芬·罗奇，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，发展论坛举行了16届，他参加了15届，不可不谓之“老朋友”。他这次带来了新书《失衡》，而他在本次论坛上发表的“‘新常态’就是下一个中国”的言论，在网络上已被热转。

还有郑永年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，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，是通过到中国许多地方实地调研亲力亲为的。他从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排序说起，谈了对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的理解，认为“经济波动太大了不叫常态，常态是中国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”。

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·罗默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·萨克斯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·诺兰……谈起中国经济新常态，这些大教授有数据有模型有比较，研究颇深。

而企业界人士比经济学家更为关心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。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·威尔士颇为“谦虚”地表示，我不是经济学家，但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、企业角度来看，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在放缓，但还是在增长，增速的放缓仍然是在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量，中国的经济正在进行转型，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。

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，是本届论坛的外方主席，“我期待着在此论坛上与大家齐聚一堂，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要义，积极探讨，共同努力，以期为各方带来积极影响！”他认为，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，将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及全球繁荣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聆听论坛，脑力激荡，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俨然一门“新学科”，而其背后的支撑，正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伟大改革实践。

观经济大势要用“大逻辑”。要探寻“中国道路”，还真不能不研究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。

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·罗奇：

“下一个中国”令全球瞩目

本报记者 李春霞

在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，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·罗奇在接受《经济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的改革路线图清晰可控，政府治理体系也在发生深刻转变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折。

作为受邀嘉宾，史蒂芬·罗奇迄今已参加了15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著述颇丰，也是最早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出系统论述的美国经济学家。

史蒂芬·罗奇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生动地定义为“下一个中国”。他认为，新常态首先是由消费者引导的、以服务业增加值为导向的。“我个人的评估是，中国服务业产值将在2015年达到GDP的60%，到2035年将达到GDP的70%，中国服务业所雇佣的劳动力要比整个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%，服务业既是劳动密集型行业，也是资源紧缩性行业，由于将近30%的参与者都来自农村，这种环境下的新常态也是更加平等和谐的。”

尽管实体经济及结构性变化都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，史蒂芬·罗奇依然强调，中国经济新常态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。西方改革的实践表明，最大的挑战是应对结构性改革的韧性或曰惰性。“尽管我们已经超出了预期。但在实现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这只是刚刚开始，这是充满挑战和困难的转型和过渡，也非常复杂，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推动力的转变，还要克服旧体制的惯性。”正因如此，史蒂芬·罗奇强调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政治经济学的应用。他表示，“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专注于执行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及简政放权的大力推进，显示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执行力。”

展望未来，史蒂芬·罗奇建议，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也要与实体经济保持一致，不仅推动行政审批、价格管制削减政策十分必要，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也可以考虑逐步解除。他表示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步子不妨放大一些，给外国资本与私营经济更多发挥能量的空间。

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3月21日在北京举行。图为与会海外嘉宾认真聆听演讲。 本报记者 陈果静摄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：

城镇化也需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

本报记者 禹洋

“中国未来的发展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顺利实现城镇化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城镇化发展也要跟着换挡，向新常态迈进。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在接受《经济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政策和区域间的协调互补，是顺利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。都市圈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要符合包容性增长的要求，各都市圈之间和各区域内的不同城市之间，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。

“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成功实现城镇化的典范之一，有效避免了城镇化中极易出现的贫民窟暴增、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。而且，城镇化对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支持作用。”古利亚说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城镇化政策和都市圈发展也需要转型升级，继续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。“在顶层设计上，要明确各都市圈的不同功能定位，促进一体化发展；在区域协调上，要关注城市间的连通性，统筹土地管理、金融和财政政策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，出台统一的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体系，避免片段式和碎片化的政策出现，实现城市间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。”

目前，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7亿人。未来5年预计还将有1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。快速城镇化让数亿农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，但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加大、基础设施发展跟不上城市扩张步伐等问题。古利亚认为，以廉价劳动力、土地经济、出口拉动和粗放型工业发展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发展路径，已经不再适合中国。同经济发展一样，城镇化也需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，更加关注城市功能的完善，提升城市运转效率。

古利亚提出，在公路网和铁路网的规划中，要充分考虑城市内和城市间的公共交通，扩大其覆盖面，连点成线、连线成网，用完善和便捷的交通网络把城市串联起来，避免因单个城市过度膨胀发展所引发的交通拥堵、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。

现场特写

“老朋友”基辛格

本报记者 孙璇

3月21日上午，9点钟刚过，北京钓鱼台14号楼牡丹厅C就被站得满满当当，大家都在翘首期待一位传奇人物的到来。

9点40分，93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缓缓步入会议厅。全场十分安静，大家期待着聆听这位从历史课本里穿越而来的“老朋友”的真知灼见。

80多次来到中国，“老朋友”基辛格与听众的对话从40多年前讲起。“回想起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，然后再看看今天，中国的巨变，超越了人类极限，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胜利。”

“人们常说美国是一个守成的大国，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，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。而我们这些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人认为，有冲突是正常的，关键是双方要管控好分歧。”基辛格语调缓慢，但思维敏捷。

“中国和美国在很多人眼中，都是永远的竞争对手，有些人也希望让我们两国产生矛盾。”基辛格直言，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分歧。他认为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时期，两国应更多关注共同利益。“我们时代的一个新特征是，很多全球性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，比如气候变化、卫生领域的一些危机，等等，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，开启一种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。”基辛格说。

基辛格在发言中。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

“40多年前我来中国时，中美处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分歧，现在中美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机遇。40年前我们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胁，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来影响整个国际体系。”基辛格总结说。

“我问刘教授一个问题”

本报记者 陈果静

“我问刘教授一个问题”，3月21日上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拿起了话筒，向台上的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遵义提问。

易纲正在提问。本报记者 陈果静摄

易纲的提问与刘遵义在发言中提及的托宾税有关。资本项目开放后如何防范热钱的冲击，是我国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，而托宾税作为一种对外汇交易征收的附加税，目的在于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，防止金融市场出现急剧动荡甚至爆发危机。

去年2月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提出，拟推出托宾税，以抑制“热钱”。至今，托宾税在我国尚未开征。

易纲问，托宾税从理论上是个好主意，但从实践上看，采用托宾税的国家如巴西、智利等，总体来讲效果并不是太好。这是托宾税本身有问题，还是采用托宾税国家的其他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？

刘遵义认为，托宾税本身并不存在问题，只是其他国家在执行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。他表示，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用人民币结算，现在放开长期资本流动是没有问题的。

而托宾税主要是针对短期资本。“我赞成实行资本自由流动，但要挡住坏的东西。”刘遵义表示，尤其是需要对投机性资本的流进流出进行适当的控制。

刘遵义建议的托宾税征收办法是：流入时不对外币征税，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征税；流出时，人民币转换成外币也征税。“自由资本流动、自主的汇率政策，还有稳定的金融体系，这3个目标看似不可能同时达到。”刘遵义说，“但当在资本流动上双向收税的时候，似乎有希望同时实现这3个目标。”

嘉宾观点

吴敬琏：

新常态仍是“进行时”

本报记者 欧阳优

>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，才有可能实现人们所期望的一种新常态

中国经济新常态，是完成时还是进行时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“新常态下论改革”分会场上，著名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，经济新常态的两个特征进度不一样，一个已经实现，一个还在进行中。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，才有可能实现人们所期望的一种新常态。

新常态下论改革，首先要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。在吴敬琏看来，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两大特征，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，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。

“对于这两个特点，大家并没有太大分歧，但是对于已经转入新常态还是正在转的过程中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”，吴敬琏判断认为，近年来中国GDP增长逐渐走低，进入中高速增长，第一个特点已经成为现实。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处于“进行时”，尚未实现，需要冷静对待。

吴敬琏指出，从历史上看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新话题，但至今仍然还面临不少难题待解。对此，他解释说，之所以造成现在的困境，关键的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。因此，提高经济质量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这一障碍。

新常态下改革该如何发力？吴敬琏表示，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，有几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。比如，农地改革、国企改革、资本市场改革，都是改革的重点所在。在谈到资本市场改革时，吴敬琏强调，资本市场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枢纽，应该把资本市场改革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地位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关键在于市场监管怎样从过去的以审批制为主的事先监管，改为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事中事后监管。“这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的非常重大的改革，这个改革非做不可。”吴敬琏表示。

林毅夫：

中国经济至少还有10年8%的增速潜力

本报记者 欧阳优

> 目前，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，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技术产业差距。差距同时是中国的后发优势，将转变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

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后，到底会维持多高的增长率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此信心满满，“中国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，会有年度经济增长8%的潜力，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。”

林毅夫表示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，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，以及有没有条件来挖掘那些潜力、把潜力变成现实增长。在他看来，后发优势是关键。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提高，靠的都是技术不断创新，产业不断升级。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最前沿，因此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。而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500美元，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，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技术产业差距，差距同时是中国的后发优势，将转变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。”

那么，后发优势有多大，怎么来衡量？“人均GDP是衡量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标准”，林毅夫提出，中国2014年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%至14%左右，按照购买力也只有美国的25%左右。从历史上看，日本、韩国以往的发展阶段，追赶差距的过程中取得了8%至9%的经济增长速度，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也具有实现8%以上增速的潜力。

在林毅夫看来，资金充足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。他提出，当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到50%，民间储蓄率将近50%，加上还有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充足，这些都是我国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异。“如果我们把这些优势都用好，就能使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比较好的发挥。”林毅夫说。

正是以这样的分析作为支撑，谈到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GDP增长7%的目标时，林毅夫表示，“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，而且很可能还会更高。”他还判断，2016至2020年的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增长率都可能超过7%。

本版编辑 李会 孟飞